

摘 要

新疆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陆路孔道，历史上先后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在这里传播、流行。基督教自唐代传入新疆后，以它特有的方式对新疆社会产生着影响。清末至民国时期是基督教在新疆活动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基督教在新疆的传布较之前有了新的特点。因而对这一时期的新疆基督教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及基督教对新疆社会的影响，而且有利于我们理解这一时期新疆省政府对待基督教的态度。

本文对清末至民国时期的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进行系统的研究，探讨在一个伊斯兰教拥有巨大影响的社会中，作为完全不同的另一文化性质的基督教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同时研究这一时期基督教的传播对新疆社会的影响。

全文以时间为序，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基督教在新疆传播的历史回顾”，追溯了清以前基督教中的一支——景教在新疆的传播概况。第二部分：“清末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主要对清末在新疆活动的三个基督教团体进行研究；分析他们在新疆传教、设立教堂和医院、开办学堂等活动；分析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探讨基督教在新疆传教不力的主要原因。第三部分：“民国时期的新疆基督教”。根据民国时期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特点，将这一时期划分为三个阶段：1912年至1937年为较快发展阶段；1938年至1944年为传教事业中止阶段；1945年至1949年为其恢复阶段。第四部分：“基督教对新疆社会的影响”。分析了各传教组织在新疆开展的传教活动，以及这些活动对新疆社会各层面产生的不同影响。

在新疆地区,基督教各教派的传教组织在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少数民族群众中传播基督教,这些传教活动历时半个多世纪,对新疆社会的经济和文化产生了一定影响。深入地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基督教在新疆的活动,对于完善新疆宗教史特别是新疆基督教的历史具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 清朝; 民国; 新疆; 基督教;

Abstract

Xinjiang is a very important land passage fo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 study on the Christianity in Xinjiang is very important not only in the history of Xinjiang religion but also for th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This dissertation focuses on the spreading of Christianity in Xinjiang from 1878to 1948 . It is included to discuss that how Christianity survived and developed in a society which Islam religion effect of religious spreading on the Xinjiang society.

The whole dissertation is composed by four parts.

The first part: The brief account of the history of spreading of Christianity in Xinjiang before Qing dynasty based on relating historic materials. It mainly retells the Nestorian's rough history in Xinjiang.

The second part: The spread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ity in late Qing dynasty in xinjiang. It discusses three major church societies existing in Xinjiang and their activities such as spreading their religion, setting up churches and hospitals and

opening schools. To analyze the religious policy made by Qing government,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reasons why Christianity failed to spread very smoothly in Xinjiang.

The third part: The Christianity in Republic of China. According to the religious spreading characters in this period, the author divides this period into three stages: The first stage is a rapid developing one from 1912 to 1937. The second stage from 1938 to 1944 is the suspension stage. The last stage is the recovering stage from 1945 to 1949.

The fourth part: The influence of Christianity on Xinjiang society.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characters of different missionaries in Xinjiang and explores their influence on different social levels.

Key Words: Qing dynasty;
the Republic of China;
Christianity.

前 言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汇聚之地，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情况错综复杂，许多宗教都曾对新疆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自唐代起就在中国社会中留下了它活动的印迹，唐朝和元朝时期，各种文献均有对基督教在新疆地区活动情况的记载。清末至民国时期，由于一些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及内地基督教组织和团体的宣传，新疆地区的基督教（主要指天主教和新教等）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局部地区对新疆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课题的研究，主要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察清末至民国时期基督教团体在新疆的传教活动，包括他们在新疆各地设立教堂、医院、开办学堂等情况，分析清朝和民国政府对基督教的态度和它在新疆传教不力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在伊斯兰教拥有巨大影响的新疆社会中，基督教是如何生存和发展的，以及这些基督教团体的活动对新疆社会产生的影响。

一、研究范围及研究方法

（一）、研究范围

基督教起源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392年罗马帝国正式将其定为国教。1054年，基督教分裂为东、西两派教会，东正教自认为是正统，称为正教，西部教会自认为最具普遍性，称为罗马公教，即天主教。16世纪，欧洲爆发了宗教改革运动，打破了罗马教会一统天下的局面，基督新教由此而生。现在的基督教（Christianity）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基督教主

要包括天主教(Catholic)、东正教(Orthodox)和新教(Protestant)三大教派,狭义的基督教专指新教,本文主要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1877年—1949年),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在新疆的传教活动及影响。

(二) 研究内容

一、基督教在新疆传播的历史回顾,主要追溯基督教在唐朝、元朝和清朝在新疆传播的概况。

二、清末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论述了清末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的概况,包括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比利时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和内地会在新疆的传教活动,并分析了清政府对基督教的政策以及新疆民众对基督教传教士的态度。

三、民国时期新疆的基督教。本部分根据民国时期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情况,划分为三个时期:1、基督教在新疆发展较快时期(1912——1937年)。这一时期不仅天主教、瑞典传教团和内地会在新疆的活动较为活跃,而且东正教也开始在新疆传播。2、基督教在新疆发展中止时期(1938——1944年)。这一时期由于盛世才政府对宗教的禁止,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一度停止。3、新疆基督教恢复发展时期(1944——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对基督教较为宽容,因而这一时期基督教在新疆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

四、基督教对新疆社会的影响。清末至民国时期,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对新疆社会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使新疆部分民众开始接触基督教,对西方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和认知。此外,在基督教的传布过程中,各派教士通过在当地开设医院,开办学堂,出版刊物等活动,把西方文明带到了新疆,客观上为新疆文化事业做出了一定贡献。

(三) 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主要采用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历史学的方法要求我们

充分的收集史料，包括当时的档案、各种社会调查资料 and 后人根据当时的文献写成的研究著作等，据此分析并解决问题。本文在广泛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对清末至民国时期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及其对新疆社会的影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

二、史料及文献

（一）档案资料

关于清末至民国时期新疆基督教问题的档案文献，主要收藏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的外事档中，这些档案内容涉及当时官方对基督教在新疆传播的记录，包括传教士人数、建立教堂及当时政府对基督教活动的关注等内容。这些档案是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新疆基督教问题的珍贵资料，可信度高，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二）清末至民国时期涉及新疆基督教传播的游记、回忆录

清末至民国时期许多西方人士来到新疆考察、探险、旅行，他们中许多人留下了游记或回忆录，这些游记或回忆录成为记录当时新疆社会、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重要的史料。

1、贡纳尔·雅林的《重返喀什噶尔》（马大正、杨镰等主编，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贡纳尔·雅林系瑞典学者，1929 年 9 月随瑞典传教小组到新疆喀什噶尔，在喀什噶尔半年多的时间里，在瑞典传教团的帮助下，雅林学习了维吾尔语，并搜集当地语言、历史文学和宗教方面的资料，1930 年返回瑞典。并于 1978 年重游喀什噶尔，1979 年完成此书，在书中主要记录了 1930 年之前传教团在喀什噶尔地区的情况，而且还从东西方文化交流和冲突（包括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在喀什噶尔地区的冲突）的角度，研究了瑞典传教团在新疆南部的传教和其他活动，所以该书对研究民国时期新疆基督教有重要参考价值。

2、凯瑟琳·马嘎特尼的《外交官夫人的回忆》（马大正、杨镰等主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 该书是英国凯瑟琳·马嘎特尼于 1931 年所著, 书中记载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瑞典传教团和传教士在新疆的情况, 对传教士在南疆的活动涉及较多, 是研究民国时期新疆基督教的重要资料。

3、马达汉的《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王家骥译, 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 2004 年版)。1906—1908 年, 芬兰探险家马达汉骑马从中亚进入我国新疆, 遍游南疆和北疆, 在这里遇到了一些传教士及皈依基督教的教徒。这些记载对本课题的研究也有参考价值。

4、《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该杂志是基督教教会杂志, 创刊于 1874 年用英文出版, 最初由美国监理会创办并主编, 后改由浸礼会、长老会等其他宗派的传教士担任主编, 最后转入上海美华印书馆刊印发行。《教务杂志》一直出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传教士离开上海后才停刊。主要记录的是清末至民国时期各宗派派遣的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其中有大量在新疆传教的传教士写的通讯和写给教会组织的信件, 是研究这一时期新疆基督教的必不可少的研究资料。

5、Mildred Cable and French Sca Francesca French: 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 《新疆的使徒—乔治·亨特》, Newington Green London, 1964. 该书是曾在中国新疆传教的英国内地会的两个女传教士, 为内地会传教士胡进洁所作的传记。书中详细记录了胡进洁从 1906 年来新疆, 在乌鲁木齐建立传教点, 进行传教活动, 1938 年被盛世才关进监狱, 后于 1946 年在甘肃去世, 是胡进洁半生在新疆传教的真实写照, 是非常宝贵的传记资料。

三、研究概况

国内关于近代新疆基督教问题的研究, 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1984 年唐世民先生在《新疆社会科学》(1984 年第 4 期) 发表《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 该文主要叙述近代基督教在新疆传播的概况。1988 年房建昌先生在《新疆社会科学研究》(第 11 期) 发表《历史上基督教在新疆》, 该文主要

利用西文史料勾勒了历史上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1989年魏长洪先生在《新疆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近代基督教传教士在新疆》，该文是一篇颇具份量的专题研究成果，文章利用详实的史料对近代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作了概述。1998年房建昌先生在《新疆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近代新疆基督教史的研究及史料》，该文章叙述了近代新疆基督教的中外史料，并勾勒了新疆天主教的基本轮廓；周轩先生和崔延虎先生合作在《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发表《瑞典传教团在喀什噶尔研究》，文章对1892年至1938年间瑞典传教团在喀什噶尔的传教活动，进行了研究。

进入2000年以后，关于基督教在新疆传播问题的研究，以木拉提·黑尼亚提先生的成果最为突出，2001年，木拉提·黑尼亚提先生提交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近现代新疆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研究》，该文对近现代西方基督教（天主教、基督新教）传教士在新疆的传教活动做了专题研究，考证了基督教各传教组织在新疆设立教堂的时间、地点，各传教团传教士离任情况，分析了传教士对新疆少数民族的民俗、语言、宗教等方面做的田野调查。全文对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的活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其后，其研究专题分别发表，具有代表性的有：2002年在《西域研究》（第3期）发表《近代新疆天主教会历史考》，该文章主要研究了天主教圣母圣心会、圣言会传教士在北疆地区的活动历史；同年在《新疆社会科学》（第3期）发《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建堂历史考》，文章根据档案资料对传教团的建堂历史进行了考察；2003年第4期发表《新疆内地会传教士传教经历及其中外文姓名的勘同》，文章研究了20世纪初内地会在新疆的传教经历、他们的往来途径和在南北疆的传教活动情况，并根据外文史料和中文档案的对比，勘同了传教士的中外姓名。

此外，魏长洪先生在2002年《新疆文史》（第1期）上发表的《基督教西北灵工团在哈密的兴衰》，详实地介绍了基督教西北灵工团的源流、组织性质与活动，阐明了西北灵工团与基督教各社团的关系，该文使用了许多罕

见的珍贵史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应当说学者们在新疆基督教传播这个领域内取得了一些成果，且研究主要集中于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过程、传教士的活动、对各地传教士建立教堂的时间、地点的考证方面，而对于清末至民国时期基督教在新疆传播不力的原因，新疆政府对基督教的态度，及基督教在传播过程中对新疆社会所造成的影响却研究不多。本文拟就清末至民国时期基督教在新疆传播过程中政府对其态度，导致基督教传播规模变化的因素，基督教对新疆社会产生的影响等问题进行研究。

一、清朝以前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众多民族、不同文化、多种宗教的汇聚之地，各民族的宗教信仰情况错综复杂，历史上新疆地区曾流传过萨满教、摩尼教、祆教、佛教、景教、喇嘛教(藏传佛教)、基督教、道教、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这些宗教都曾对新疆社会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关于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当时被视为异端的基督教的一支——景教，通过西域传入长安，开始了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滥觞。

景教产生于公元五世纪的拜占庭，因其创始人为聂斯托里，故又称聂斯托里教。聂斯托里原为叙利亚神甫，公元428—431年任君士坦丁堡总主教，因其学说与当时流行的基督教义不相一致，在公元431年以弗所会议上被贬斥为异端。聂斯托里被流放，其教徒逃亡波斯。景教由波斯传播至中亚，并于唐贞观九年，由叙利亚人阿罗本传入中国。^①其具体传入路径“景教东来，当取途于乌浒河(Oxus)南之大夏……经行巴达克山(Badakshan)、葱岭(Pamirs)……而至和阗(Khotan)，遵玄奘之归途而至长安”。^②因此，景教应通过西域的疏勒、于阗、龟兹和高昌等国传播到长安。

景教传入中原正值唐朝鼎盛之际，初入中原的景教传播、发展很快，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至高宗时，已是“法流十道”(唐朝时全国共设有10个道)，“寺满百城”了。^③同时，高昌(今吐鲁番)、沙州(今敦煌)等地景教徒的活动较以往明显活跃。然而，会昌五年(845年)七月，唐武宗下令全国灭佛，景教连同祆、回教也都受到牵连，自此之后，景教在中原一蹶不振。

“会昌灭法”后，内地景教徒被迫流落到西北边远地区，外来传教士和

① 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

② 冯承钧：《景教碑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58页。引自徐永志：《景教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③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引自阿·克·穆尔著，郝镇华译：《一五五零年前的中国基督教教史》，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3页。

一些坚持信仰的景教徒被迫逃亡边境地区，在那里继续活动。近代考古学家先后在吐鲁番、伊犁及内蒙古百灵庙等地发现了许多景教徒墓碑，法国学者那乌教授和俄国学者卡瓦尔松教授认为这些地方曾经是景教徒的聚居点^①。

漠北回鹘汗国瓦解后，其大部分部众从蒙古高原西迁至高昌，开始受到当地仍在流行的景教的影响。9世纪中叶后，高昌地区转而成为当时景教在中国传播的中心地之一。喀什噶尔(今喀什)地区的景教信仰也逐渐流行起来，12世纪末，该地建立了总教区，^②成为景教传播的另一中心地。

元代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仍是景教传播的重心所在。当时西域地区许多维吾尔族人信仰景教，这些维吾尔族景教徒中最著名的是拉班·扫马，他曾奉元朝政府之命，出使欧洲，拜谒过教皇和英、法国王，在中西交通史上写下了重要而光辉的一章^③。元代西域“可失合儿(今喀什)，此地有不少聂思脱里派之基督教徒，有其本教教堂”。“鸭儿看”(Yarkend……亦有涅斯托利派(Nestorian)同雅各派(Jacobites)之基督教徒)^④“哈密，亦有主教区设置”^⑤。景教在西域的传播，促进了当地民族与西方文明的接触，沟通了中西贸易往来。

元代末年，由于中亚地区伊斯兰化的影响，加之景教长期依附于蒙元政治势力，浮于社会的表层，使得景教的生存与发展空间渐趋收缩。元朝灭亡后，景教也随之在新疆地区衰落。

清朝前期，由于一些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及内地基督教组织和各团体的宣传，新疆地区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新教、东正教)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一时期基督教对新疆社会影响较小。

① [韩国]李宽淑著：《中国基督教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页

② 魏良弢：《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1991版，第137页。

③ 杨富学：《回鹘景教研究百年回顾》，曹中建主编：《中国宗教研究年鉴》1999—2000，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395页。

④ 马可波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版，第87页。

⑤ 张星娘：《元和元以前中国的基督教》，《元史论丛》(1)，中华书局1982版，第138页。

二、清末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

（一）清末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与发展情况

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基督教又一次传入中国，这是基督教继唐代景教、元代也里可温教和明代耶稣会士后第四次传入中国。近代基督教几乎在中国每个省区都留下了传播足迹。基督教一方面在沿海内地建立传教布道基地，另一方面也浸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开始在新疆进行传教活动，力图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基督教，使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群众改宗。

清朝末年，在新疆活动的基督教主要有三个派别：瑞典传教团、比利时天主教的圣母圣心会和英国内地会。天主教的圣母圣心会集中在伊犁、霍尔果斯、玛纳斯、呼图壁和乌鲁木齐等北疆地区传教，瑞典传教团主要在南疆喀什等地，英国内地会主要以乌鲁木齐为主要传教点。这些传教团在新疆建立教堂，翻译《圣经》等宗教刊物，开办医院，开设学堂，在当地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东正教在新疆也有活动。

1、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的传教活动

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西方传教士也藉殖民主义侵略势力纷纷进入了中国。瑞典传教士来华传教始于19世纪中叶，而较大规模的、有组织的来华传教则是在19世纪80年代后，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也叫瑞典行道会）是瑞典教会派往中国传教的诸多传教组织之一。

瑞典传教团在新疆的传教活动可回溯到1892年，“瑞典传教团多年在俄罗斯高加索地区以及中国河北地区都有自己的传教点”，^①为了连接这两个传教点，他们希望在这两个地区之间建立一个新的传教点。作为新疆南部的政

^① [瑞典]贡纳尔·雅林著，崔延虎、郭颖杰：《重返喀什噶尔》，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0页。

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喀什噶尔，无疑成为很好的选择。瑞典传教团于 1891 年 11 月由瑞典教会派往新疆传教，同年 12 月，在高加索梯夫利斯担任传教士的 N·F·豪伊杰尔与一名土耳其人约翰尼斯阿维尔塔兰尼恩及另两名亚美尼亚人前往喀什噶尔作试探性旅行。1892 年 1 月，他们到达喀什噶尔，几天后其他人返回，而阿维尔塔兰尼恩被留在喀什噶尔开展传教活动^①。阿维尔塔兰尼恩是由信仰伊斯兰教改信基督教的，而瑞典传教团的主要任务就是让穆斯林改信基督教，阿维尔塔兰尼恩将《圣经》的一部分翻译成维吾尔文，后来在《圣经》的翻译中与他其他传教士发生严重分歧，他本人于 1897 年离开了传教团，在保加利亚定居。1892 年 2 月，瑞典传教士玉本体、沙一浦来到莎车传教，1893 年在莎车县建立瑞典教堂，这是清末南疆地区最早出现的基督教堂^②。

1894 年，瑞典教会正式在喀什噶尔建立传教团，并积极向新疆西南地区发展，1897 年 9 月建立了疏勒县教堂，1901 年建立了疏附县教堂。这一时期先后来到新疆喀什进行传教活动的瑞典传教团传教士有“拉尔斯·艾瑞克豪格伯格、何各伦德、恩瓦尔小姐（70 岁，工作了 17 年）等 17 人”，其领导人物是拉尔斯·艾瑞克豪格伯格，“他成为瑞典在新疆所有传教活动的开拓性人物。”^③这些来疆的传教士，大多素质较高，受过高等教育，如传教团的一个重要成员古斯塔夫·拉奎特，曾获得英国利物浦大学热带医学博士学位。喀什噶尔传教团早期活动主要是将《圣经》翻译成维吾尔语，把传教活动与兴办福利性质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相结合，开办医院、学校、印刷等社会服务事业，进行教育传教和医疗传教，通过免费的医疗和教育，以此融入社会，求得当地群众的认同和对上帝的信仰，扩大影响。1901 年传教团在疏附县建立了福音堂医院，1903 年建立了学堂，有学生 16 名，其中女学生

①[瑞典]贡纳尔·雅林著，崔延虎、郭颖杰：《重返喀什噶尔》，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 年版，第 267 页。

②木拉提·黑尼亚提：《喀什噶尔传教团建堂历史考》，《新疆社会科学》，2002 年第 3 期。

③[瑞典]贡纳尔·雅林著，崔延虎、郭颖杰：《重返喀什噶尔》，新疆人民出版社，第 267 页。

8名，除了瑞典教员外，还有一名维族教员阿不多月力，用维吾尔文教学^①。1904年瑞典基督教行道会驻喀什代办处，有男女传教士7人，城内有20余名信仰基督教的信徒，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该代办处瑞典传教士和其他工作人员，大多安分守法，传教、行医或翻译印刷宗教书刊在城内销售。1908年，传教士荣通贵等在疏勒县城北门外建立福音学堂，召集贫寒子弟入学，聘任汉文教员教授汉语，有学生100多人，两个男生班，一个女生班，有4名瑞典老师，学制从初小到高小，平时正常上课，星期日念经。^②从1908年起直到1938年撤离，传教团“每年都出版历书，对当地居民特别实用，受到群众欢迎”^③。据载清末新疆瑞典传教团计有牧师1人，男传教士4人，女传教士4人，医生2人，教徒约36人^④。

应当说，瑞典传教团是在新疆南部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传教组织。

2、比利时天主教圣母圣心会的传教活动

鸦片战争后，比利时传教士也陆续来华进行传教活动，他们与其他西方传教士来华的历史背景基本相同，早在瑞典传教团在新疆南部喀什噶尔进行传教活动之前，比利时的传教士已在北疆开始了传教活动。比利时传教士在新疆的传教活动主要是在圣母圣心会的组织和领导下进行的。圣母圣心会（拉丁文 Congregatio Immaculate Cordis Mariae），意为玛丽亚无污心会，创建者为比利时人南怀仁。比利时天主教的圣母圣心会，是最先到新疆传教的西方教会组织。^⑤1883年11月26日，甘肃主教韩默理派荷兰人石天基、杨广道和比利时人戴格物三名传教士到伊犁开辟新教区，三人到达伊犁，当时伊犁约有100位教友，^⑥后来石天基被任命为伊犁传教团的最高负责人。圣母圣心会新疆独立传教区是1888年10月5日罗马教廷宣布从甘肃中亚地区

①新疆档案馆外事档案 1-2-361。

②周轩、崔延虎：《瑞典传教团在喀什噶尔研究》，《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

③木拉提·黑尼亚提：《喀什噶尔传教团建团历史考》，《新疆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④魏长洪：《近代西方传教士在新疆》，《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⑤木拉提·黑尼亚提：《近代新疆天主教会历史考》，《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

⑥汤开建、马占军：《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新疆传教考述（1883-1922）》，《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

分会分出，比利时传教士到达伊犁后，积极开展传教活动，但初期并不顺利，发展速度缓慢，从教人数极少。当时“新疆回民各有信仰，不入其教，”^①所以，传教士很难获得当地百姓的认可和理解，“绥定县或伊犁府城内或近郊有二千多户，在筑有城墙的市内，大都是汉人，主要来自天津，而在城郊及周围地区，几乎全是萨尔特人。比利时天主教派驻了一位神父(斯坦曼神父)，但他们在这里和伊宁都几乎不可能从回民中找到皈依天主教的教徒”^②。面对不利形势，石天基等人调整传教策略，由过去向维、回族居民传教，改向那些宗教信仰淡薄的汉民传教，但结果仍很不理想。直到1887年石天基神甫才在伊犁建立宁远天主教堂，1895年只有石天基一人在伊犁顽强传教。1896年石天基在向绥定(霍尔果斯)地方政府提出买地建教堂的计划，由于地方政府的阻挠而搁浅。^③

1895年底在石天基请求下，甘肃主教派荷兰籍神甫高培信等两人协助石天基在伊犁传教。高培信来到伊犁后在绥定建立了天主堂。1908年雷济华在迪化建立了天主教堂，有女教士1人，教徒83人，后来雷济华被派往玛纳斯。^④雷济华于1910年在玛纳斯建立了天主堂，“信天主教者，男10人，女13人”^⑤。

总的来说，天主教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士在新疆虽然积极开展了传教活动但是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据考证，清末新疆仅有天主教神甫3人，男传教士2人，女传教士1人，教徒约246人，发展缓慢。^⑥

3、内地会在新疆的传教活动

内地会是一个专门面向中国传教的组织。1865年6月由英国传教士戴

① 《新疆省疏勒县调查外国驻华传教教堂驻在地点及教士姓名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② 柏来乐：《关于中国事件的补充函电中国第三号附件》(1911年)，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18页。

③ 汤开建、马占军：《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新疆传教考述(1883-1922)》，《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

④ 汤开建、马占军：《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新疆传教考述(1883-1922)》，《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

⑤ 木拉提·黑尼亚提：《近代新疆天主教会历史考》，《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

⑥ 魏长洪：《近代西方传教士在新疆》，《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德生创立于伦敦，开办经费仅 10 英镑，但发展十分迅速。总会设于伦敦，在美国、澳大利亚等设有分会。1866 年 10 月进入中国，1872 年在上海设立总部，该会派遣大批传教士深入中国内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内地会在新疆的传教时间在 1906 年，地点设在迪化，创建人为胡进洁。胡进洁出身于英国金卡丁郡，于 1889 年到甘肃传教，1906 年 3 月 27 日，他到达迪化，决定开辟内地会在新疆的传教点。在迪化，他声称自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在这里受到了礼遇。迪化的行政官给他送来了一封客气的信件，并送给他喂养马匹的饲料作为礼物^①。胡进洁曾于 1906 年和 1912 年两次到喀什拜访瑞典传教团，学习维语，带回了瑞典传教团编译的维语基督教宣传册。1907 年，胡进洁在乌鲁木齐文庙街建立了教堂。但与其他传教团相比，内地会传教时间较晚。

1907 年 4 月 25 日，胡进洁从乌鲁木齐到上海参加了内地会总部召开的大会，当时他认为“内地会总会给内地的传教活动给予了太多的关注，而那些更广大的边远地区的传教工作却很少被提及，”他还认为“教会应当派最有经验的教士们到新疆，争取赢得当地人信仰基督教。”甚至希望有人能够“承受痛苦的重任，去做为穆斯林布道的先驱。”^②这是胡进洁独自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教的内心感受。他从 1906 年——1914 年在新疆传教八年，1908 年，他在写给《教务杂志》的传教汇报中提到：从 1907 年 11 月至 1908 年 2 月中国人的新年之际，他用油印机印刷了近一千册挂历，并在他自己设立的书店销售了一部分由英国圣公会邮寄来的汉语和阿拉伯文基督教福音书，这些福音书引起了当地人的很大兴趣^③。1909 年，他在写给英国圣公会的信中提出，新疆需要 8 种不同文字的福音书，包括俄、塔塔尔、维吾尔、

① Mildred Cable and French Francesca French: *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 《新疆的使徒——乔治·亨特》，Newington Green London, 1946, p. 22.

② Mildred Cable and French Francesca French: *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 《新疆的使徒——乔治·亨特》，Newington Green London, 1946, p. 30.

③ 《The Chinese Recorder》, p. 467 《教务杂志》，1908 年第 8 期。

哈萨克、蒙古、满、柯尔克孜和藏文。他希望该会能提供帮助^①。1912年他第二次到喀什噶尔，拜会了瑞典传教团并在他们的指导下进一步学习维吾尔文。同年底，胡进洁带着瑞典传教士编译的维吾尔文基督教福音书，回到了乌鲁木齐的福音堂^②。

此外，基督教的另一支派东正教，也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新疆，主要是新疆俄罗斯族人信奉的宗教，集中于乌鲁木齐和伊犁。

东正教传入新疆是伴随着沙俄帝国对华侵略而展开的，1858年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俄国利用不平等条约所取得的特权逐步从北京向中国其他地方扩展，同时，俄国开始在新疆建立教堂，成立新教会，发展新疆教徒^③。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廷被迫向各帝国主义列强赔款，沙俄将部分赔款用于东正教的传教事业。因此，俄国在华的传教团又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利用清政府为其传教自由所敞开的大门，使宗教迅速向我国各地发展。俄国这时很快在各地建立教堂，接着，又在新疆、内蒙古等地建立了教区。^④总的来说东正教在新疆的传播范围和影响都较小。

（二）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及新疆民众对基督教传教的态度

鸦片战争后，基督教成为西方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副产品，清政府对曾经禁止的基督教实行了弛禁政策，基督教传教活动开始大范围、全方位涌入中国，各教会的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内地甚至偏远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但传教人员中也有冒险家和投机者及刺探收集中国情报的人，他们依仗列强胡作非为，被称做“洋鬼子”，引起民众反感和仇视，引发反教的教案，一些地方政府出现勒民背教的事件，“教案引起国际交涉，列强对清朝从中央到地方施加压力，敲诈勒索，每次都以巨额赔款和对中国

① 《The Chinese Recorder》，p. 469 《教务杂志》，1908年第8期。

② 魏长洪：《近代西方传教士在新疆》，《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③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

④ 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官民严重惩罚而告终”^①。但由于官民不满，仇视心理加重，结果成为引发更大教案的隐患，义和团运动中灭教活动由此产生。这一时期，清政府害怕教案引发冲突，引起国际交涉，导致列强军事入侵，采取不与基督教相争相攻的思想和“务使中外相安为要”^②的政策。

近代以来，英国和沙皇俄国一直窥视新疆，清朝政府自1878年平定阿古柏入侵后，对外来宗教和外来势力的介入始终保持很大戒心，警惕性很高。对瑞典传教团和圣母圣心会等基督教传教活动，采取不欢迎、戒备、抵制和排斥的思想及政策。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发生的法国大使馆致函中国外务部，指责“伊犁地方官勒令教民背教”一事，反映了当时新疆地方官员及新疆当地民众对基督教的态度。

接到外务部的指令后，伊犁将军责令锡伯营及伊塔道对此事进行调查。伊塔道领事调查后回复，绥定县和宁远县等“并无地方官勒令教民背教情事”。而据锡伯营领队大臣的调查，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七日确有法国传教士二人及随从人员四名来到锡伯营八牛禄，锡伯营对其态度友好，将档房腾出供其住宿“并送羊米面料草柴，派兵二名照料”。十二月十四日，法国传教士告知八牛禄佐领说他在去基督教教民福禄善家时，途中遇见福禄善的侄子达哈春等人，这些人阻止法国传教士，不准其到福禄善家。八牛禄佐领“将达哈春责成完事”。事毕，该法国传教士返回宁远的教堂。而在此前的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三日，法国传教士雷济华等二人也曾率随从五人来到锡伯营，佐领安排在档房住宿后，雷济华等人要求向八牛禄佐领“另备房屋给他居住”，佐领回称，“旗营地方并无闲室房屋可以借给”，雷济华等人非常不满。他们在档房久住两个多月，给办公带来不便，但是佐领仍然“遵顾邦交”，

① 于本源：《清王朝的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

② 于本源：《清王朝的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1页。

“客礼相待，并未与他计较”。^①可见，地方政府对传教士虽以礼相待，但对传教活动也未给予支持。而当地民众虽有信教者，但也遭到来自家人的反对。

清末基督教传教组织在新疆传教不利的主要原因，除地方政府不支持外，新疆的宗教习俗和传统习惯及民众的态度也是其传教不顺利的重要原因。伊斯兰教在新疆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在穆斯林群众中有很深的影响，同时当地穆斯林群众对基督教徒也持不友好的态度，把他们看成不可信任的“异教徒”^②，让他们改宗既要克服宗教心理，又要克服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传教士在穆斯林群众中传教难度很大，因而转向对当地汉族居民传教。但由于基督教教义与汉族居民传统文化存在很大差异，传教也很不容易。曾在俄国驻新疆领事馆工作多年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在他的书中说到：“在喀什，有瑞典的新教传教士团，有一时期还有过天主教的传教士团。但都没有作为，收不到新教徒——问题在于穆斯林很难改信基督教的。至于在喀什的汉族人，最好根本不要劝他们信奉基督教，他们热衷于金钱，什么宗教也不能吸引他们。”^③疏勒的基督教徒“皆津商汉民，”^④迪化县教堂“教务均系直隶人，其信徒马良佐等 144 口均属直隶属民，本省人只有张数森、李怀义二名，”^⑤所以，即使当时新疆有汉族基督徒，他们大多也是来自内地，新疆本地的汉族人中很少有人信仰基督教。

19 世纪中叶以后，比利时、瑞典等国建立的基督教行道会，开始向伊斯兰教根基甚深的我国新疆传教。1892 年瑞典基督教行道会来到喀什噶尔传教，设立驻喀什代办处，此后就以喀什噶尔为中心逐步向外扩展；1883

①（外务部档）《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第 3 册），中华书局 1996 年版，第 630—631 页。

② 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 239 页。

③ 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 年版，第 90 页。

④ 《新疆省疏勒县调查外国驻华传教教堂驻在地点及教士姓名表（备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⑤ 《新疆省迪化县调查外国驻华传教教堂驻在地点及教士姓名表（备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年比利时天主教的圣母圣心会以伊犁为中心传教，1908到1910年之间建立了玛纳斯天主堂和迪化教堂，逐渐形成了一个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网络。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通过办福音堂，育孤院和教会的医院，渐渐赢得了当地部分居民的信任 and 好感。与内地相比，清末基督教各传教团体在新疆没有受到义和团运动的影响，但传教难度仍然非常大，发展十分缓慢，被称作是“世界上基督教收成最差的地方”^①。

表 1：疏附县外国驻华传教教堂驻在地点及教士姓名表^②

某国教堂	教堂名称	设立年月	驻扎地点	距城里数	有无分驻警兵	教士姓名	教士男女若干人	教士到堂年月
瑞典	福音堂	光绪十七年	县城南门外	不及一里	无	男：鲍茂伯，贺满森 女：寅格包，安德生，司芬孙	男女教士五名又鲍茂伯小女一口共计六丁口	民国五年

表 2：疏勒县外国驻华传教教堂驻在地点及教士姓名表^③

某国教堂	教堂名称	设立年月	驻扎地点	距城里数	有无分驻警兵	教士姓名	教士男女若干人	教士到堂年月
瑞典	福音堂	光绪二十三年	汉城北关门外	半里	无	男：柏尔森，汤贵德 女：劳生	三人	柏尔森民国八年八月； 汤贵德、劳生均十二年十一月

① 汤开建、马占军：《清末民初圣母圣心会新疆传教考述（1883-1922）》，《西域研究》，2005年第2期。

② 《新疆省疏附县调查外国驻华传教教堂驻在地点及教士姓名表（备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③ 《新疆省疏勒县调查外国驻华传教教堂驻在地点及教士姓名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表 3：迪化县外国驻华传教教堂驻在地点及教士姓名一览表^①

某国教堂	教堂名称	设立年月	驻扎地点	距城里数	有无分驻警兵	教士姓名	教士男女若干人	教士到堂年月
奥国	天主堂	光绪三十三年	小南门外	约半里许	无	雷德满	一人	民国十一年
英国人	福音堂	光绪三十三年	本城文庙街	城内	无	胡进洁，马尔昌	二人	光绪 3 年，宣统三年

表 4：绥来县外国驻华传教教堂驻在地点及教士姓名一览表^②

某国教堂	教堂名称	设立年月	驻扎地点	距城里数	有无分驻警兵	教士姓名	教士男女若干人	教士到堂年月
德国	天主堂	宣统二年	县属东二宫	十里	无	奚伯鼎	只男教士一人	雷济华系光绪 29 年 9 月到，奚伯鼎系民国 11 年 7 月到

由以上各表可以看出，清末民初，基督教主要在喀什、疏勒、疏附、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传播，传教士到达以上地区后，在当地都建立了教堂。传教士来疆人数并不多，疏附有男女传教士 5 人，他们都通过行医传教，疏勒有 3 名传教士，乌鲁木齐有两座基督教堂，总共有传教士 3 人，玛纳斯有传教士 1 名，他们在新疆发展教徒极少，且教徒绝大多数为汉族，未见有穆斯林改宗。虽然外国传教士选择了新疆较为繁华、人数较多的城市传教，但清政府的不支持和新疆民众根深蒂固的宗教传统和习俗，使基督教传教活动始终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对新疆民众的影响十分有限。

① 《新疆省迪化县调查外国驻华传教教堂驻在地点及教士姓名一览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② 《新疆省迪化道绥来县调查外国驻华传教教堂驻在地点及教士姓名一览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三、民国时期新疆的基督教

民国时期是中国天主教传教事业的发展较快时期，外国天主教修会进入我国，新疆地区的外国传教会团由清朝时期的三个团体增加至九个，有法、英、俄、德、荷、瑞典、比利时等国的传教士来到新疆，他们在天山南北许多地区建立教堂，并将基督教的圣经翻译成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在这一时期，新疆的政治形势和政局的变化对基督教的发展影响很大。

民国时期，由于受政治形势和政局变化的影响，基督教在新疆明显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第一阶段为较快发展时期（1912—1937年），第二阶段是传教事业中止时期（1938—1944年），第三阶段是基督教传播的恢复时期（1945—1949年）。

（一）较快发展时期（1912年—1937年）

民国初期，政府对基督教的政策较清朝比较宽松。一方面各地军阀割据形成了自己的势力范围，其背后都有各自的列强支持，成为列强的代理人，为迎合西方列强，一些军阀首领和资本家开始信仰基督教。另一方面随着清王朝的覆灭，民主、民生等思潮兴起，出现对西方文化的崇拜，基督教在中国逐渐本地化，成为联系中西方文化的桥梁。在这种政治和文化气候下，基督教在内地和新疆的传播比较快，当时相继进入新疆传教的教会有：圣公会、浸礼会、内地会、长老会、美以美会、信义会、安息日会、卫理公会、循道会等外国传教会，教派也较繁杂。^①

1、天主教传教活动

民国时期的新疆，天主教比新教传播早，而且影响大，得到较快的发展。1920年全国天主教有54个宗座代牧区，每个代牧区有一座主教座堂，

^① 唐世民：《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

一般有一所修道院，一所或几所高级小学，一所中学以及医疗工作机构，有数目不等的宣教总堂，每个宣教总堂一般都驻有一个或几个神父。新疆成为具有宗座代牧区条件的监牧区，新疆代牧区是伊犁传教修会，地点在绥定。伊犁传教修会即圣母圣心会，最高负责人石天基于1918年2月19日病逝于伊犁传教团总堂驻地霍尔果斯，1918年6月8日高东升（荷兰籍）被任命为伊犁传教团最高负责人。圣母圣心会从1878年传教至1922年历经44年的发展，到1920年全疆有天主教信徒340人^①。

天主教在新疆的教堂主要设在伊宁、乌鲁木齐、霍尔果斯、玛纳斯、呼图壁等地。宁远（伊宁）天主教堂（1887年建），由石天基和梁明德建，1921年9月龚峨德接替梁明德任堂主，^②1924年有男女教徒107人，其中女教徒51人；^③乌鲁木齐天主教堂（1907年建）在新南门，负责人是雷济华神父，女教士1人，时有教徒83人，^④1918年搬到新南门外东路，高日升和高东升兄弟先后任该堂神父。^⑤1921年设立学堂，1924年有教徒386人，该堂由传教士雷济华、高日升和高东升兄弟、奥地利籍教士雷德民、魏义安、奚伯鼐等6人先后任该堂神父，1931年11月，鄂修德到伊宁传教。玛纳斯县天主教堂建立于1910年，系德国传教士雷济华设立，当时有教徒23人，1915年荷兰传教士夏荣昌接替了雷济华，1921年7月德国传教士奚伯鼐接替夏荣昌，1925年至1945年有四位神父：魏义安（1927年）、德国传教士齐玄根、赵绥（1929年）和荷兰传教士米德林（1933年）到该县传教。^⑥呼图壁天主教堂设立于1916年，由迪化天主教堂拨款修建，从民国五年（公元

①[韩国]李宽淑著：《中国基督教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56页。

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外事档案1—2—1010。

③ 木拉提·黑尼亚提：《近代新疆天主教会历史考》，《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

④ 《新疆图志·交涉卷》，第57卷，交涉六，第8页。

⑤ 吉六：《从〈新疆图志〉谈外籍教会的问题》，《新疆文史资料》（第3辑）。

⑥ 木拉提·黑尼亚提：《近代新疆天主教会历史考》，《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

1915年)建堂开始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被盛世才查封为止,呼图壁的天主教堂在二十三年中,先后有三个主管教堂并传教的神甫(神父),他们是:魏神甫(其名不详),葛纶普神甫,赫白良神甫。都是德国人。^①

天主教的宗教活动,有时在教堂内领导教徒进行礼拜仪式和传讲教义,有时也在街道或庙会上廉价出售或者散发《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等用汉文印的圣经,同时神甫还操着汉语,向人们宣传教义。教堂还给人们借贷银钱和粮食,或看病给药。天主堂神甫常常穿上洋教服,坐在高头大马的皮包车上,在大街来往、游逛,这就是外国人最早在呼图壁县小街留下的足迹,也是本县群众用西药治病的开始。呼图壁县信仰天主教的男女教徒,多时是30多人,他们大多是贫困户,有修女一人。由于在汉族人中,有信仰佛教和道教习俗,他们对外来的天主教并不热心,所以,尽管传教神甫作了努力,但入教的新教徒还是寥寥无几。如天主堂是建在徐姓较多的徐家庄附近,徐姓人有的给教堂干活也有多年,但他们之中却无一人入教^②。

由于圣母圣心会传教工作进展较慢,在新疆的力量较小,1922年,罗马教廷将新疆教区圣母圣心会的传教工作交给了德国圣言会,一直到新疆解放。1922年后圣言会负责的新疆教区属西部甘肃代牧区^③。1931年,新疆天主教独立布教区成立,德国籍神父卢裴德成为负责人。

2、耶稣新教的传播——瑞典传教团的传教活动

瑞典传教团传播基督新教,他们在南疆工作了20多年,其影响扩展到很多地区。1922年上海出版的《中华归主》(The Christian occupation of China),提到:“除焉耆府、库车府、温宿府、乌什府则为基督教空白区外,喀什、疏附县、疏勒府、英吉沙、莎车府为瑞典传教团的传教点”。传教士

①李长青:《天主教在呼图壁》,《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②李长青:《天主教在呼图壁》,《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③房建昌:《近代新疆基督教史的研究及史料》,《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通过开办医院、劳动孤儿院等活动传教。由于南疆地区穆斯林群众居多，“掌教大阿訇在南疆威权颇高，维族人恐不敢改信异教”，因此教徒都是来自内地谋生的汉人，也有少数贫病交加的维吾尔人接受了洗礼。^① 虽然教徒数量没有大的发展，但其传教点多，据 1924 年新疆省政府核查“各属有教堂者，即迪化、绥来、伊宁、疏附、疏勒、英吉沙、莎车等县，”^② 有喀什、疏附、疏勒、英吉沙、莎车等 5 座教堂。

瑞典传教团在南疆的活动范围很大，主要以开办医院、学校等社会服务及慈善性质的工作较多，并对南疆地区的人文、民俗进行研究调查，形成了一些研究著作，使世界对新疆有了进一步认识。

3、内地会的传教活动

民国时期内地会的传教活动十分活跃。在新疆活动的内地会传教士前后有十多位。这一时期，内地会传教士来到新疆的人数较多，活动范围较广，但他们只是成功地使一部分汉族人皈依了基督教，在少数民族中用医疗作为传教的辅助手段，最终没有获得成功。

1914 年内地会传教士马慕杰来到新疆和胡进洁一起，在南北疆游历、传教，曾到过阿勒泰、塔城和伊犁的哈萨克、蒙古牧区，并在南疆的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地散发基督教宣传册，宣讲教义。1918 年马慕杰在致英国圣公会的报告中说，他正在编写《蒙英词典》，新疆需要多种不同少数民族文字的福音书，要求圣公会给予支持。由于长时间在哈萨克族、蒙古族中传教，他们基本掌握了这两种语言。1927 年年初，英国圣公会组织鉴于马慕杰已有 15 年未返国探亲，决定让他回国休假。马慕杰通过塔城经苏联的西伯利亚铁路返回了英国。1928 年 8 月 5 日，马慕杰以马尔昌之名与另一位英籍驻喀什噶尔传教士马那，经印度通过喀喇昆仑山进入新疆。胡进洁特意从乌鲁木齐赶到喀什噶尔迎接。1928 年 10 月 7 日，胡进洁和马慕杰到达乌鲁木齐的福

^①吉六：《从〈新疆图志〉谈外籍教会的问题》，《新疆文史资料》（第 3 辑）。

^②《金树仁就保护教堂教士事致交涉署的呈》1924 年 5 月 19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音堂^①。1928—1932年，内地会游历的传教士来到新疆的先后有：英国三妇女传教士、胡立礼。1932—1938年在新疆活动的内地会传教士有美国传教士石爱乐及英国传教士巴福义、柏爱生、何仁志、赵立德、朱佩儒等人，他们于1932年11月初抵达乌鲁木齐^②，1938年5月26日，由于盛世才的驱逐，他们被迫离开了乌鲁木齐。

4、东正教在新疆的传播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取消了东正教的一切特权，但仍然承认东正教是一个合法的宗教团体，允许教徒过正常的宗教生活。可是，沙俄在北京的传教士团却拒不承认十月革命后俄国国内的东正教会莫斯科教廷，长期依附于居住在塞尔维亚的流亡教廷，即卡尔洛夫齐东正教会，积极参与国际宗教反动势力的反苏反共活动。北京传教士团和中国各地的东正教教堂，实际上都成了沙俄白匪进行反共反苏的据点。形形色色的流亡分子，包括贵族、军官、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等，纷纷窜到中国的新疆、哈尔滨、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地，受到了当地东正教组织的接待和安置。第二十届北京传教士团领班、大主教魏克托尔，就是一名旧军官，他于1920年逃到新疆，又随一批白俄来到北京^③。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各地的沙俄东正教会又成为日本侵略者进行反苏、反共、反华的工具^④。

1917年后，在新疆有东正教堂若干座。新疆的东正教堂设在乌鲁木齐、塔城、伊宁、绥定、霍城等地，也形成了一个教区，教区大主教由北京传教士团委派，教徒最多时达1万人^⑤。

5、这一时期基督教传播发展较快的原因

民国以来，由于新疆省政府对基督教的态度比较宽容，基督教在新疆传

① Mildred Cable and French Francesca French: *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 《新疆的使徒——乔治·亨特》，Newington Green London, 1946, p. 72.

② 《The Chinese Recorder》, p. 128 《教务杂志》，1933年第2期。

③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8页。

④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9页。

⑤ 约格·索夫罗尼：《新疆东正教会史是沙俄在新疆的殖民史》，打印稿，1977年俄文版，转引自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

播范围逐渐扩大，他们通过开办孤儿院和医疗事业，扩大了基督教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以来，内地出现了“非基督教运动”，这种反教思潮认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先锋”，“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手段”^①，由此，反教运动遍及全国，1924年后，由于“近来各处教堂教士辄有被匪劫掠情事，甚或酿成戕教重案，不惟交涉发生困难，国际信用殊受影响，”^②国民政府对于基督教的态度是“各国在华教堂教士地方官应予尽力保护，”^③此后，各地展开了对基督教堂保护措施的清查工作，新疆省政府的行政命令下达到各地州县，有些地区并无教堂，也向政府汇报了当地清查的情况，例如，巴楚县“侨居英俄各民，大都从事商业，并未设有教堂，亦无外国传教之人。”省政府也令其将“教堂及调查教堂国籍、教堂名称以及有无外国教士详细查明列表”^④，叶城“县境并无教堂亦无教士，无从列表。”^⑤“查阜康地方苦瘠，向无外国人在县属租赁房屋，开设商号以及设立学堂、教堂、医院。即人民亦无从出洋各情事，无从填表”^⑥。可见，各地对这项工作都非常重视，不管当地有无教堂，都一一向省政府做了汇报。

在中央政府的指令下，新疆省政府这一时期对基督教基本上采取保护的政政策。省政府采取的保护措施是，“将各国教堂所在地点商承军长酌拨军警驻守保卫，其偏僻之地必须设法使消息灵通，得以随时戒备。并迅饬将各教堂国籍、教别名称及所在地点以及有无外国教士详细查明”^⑦。但又考虑到新疆的具体情况“新疆教堂无多，民教尚属相安，惟近来疏附、莎车两县偶有一、二缠民入教”，外务部要求各地派军警驻守教堂，以防止发生争教风

①张西平、卓新平：《本色之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536页。

②《金树仁就保护教堂教士事致交涉署的呈》1924年5月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③《孝昌就保护教堂教士事致樊耀南的呈》[1924年3月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④《段琮就巴楚并无教堂教士无从列表事致樊耀南的呈》1924年3月2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⑤《王之佐就叶城并无教堂、教士无从列表事致樊耀南的呈》（1924年3月2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⑥《宋法灏就阜康并无外国人居无从填表事给樊耀南的呈》（1924年6月1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⑦《金树仁就保护教堂教士事致交涉署的呈》（1924年5月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潮，防患于未然，而省政府认为新疆教堂“向无被匪劫掠及戕教情事，若派军警驻守恐民间不知底蕴反滋误会”。并且对传教士予以保护，“地方文武认真保护，以符约章”。所以要求“地方文武随时留心，秘密防范，并令随时开导该处阿訇人民申明民国法律信教自由，务各守各教，不得互相訾诋，以免莠民藉端生事”。这样，则既“不与部令相背驰，而地方亦可消患无形矣”。^①最终省政府没有在新疆境内的教堂派驻警卫，而是以疏导、教育为主，使各族人们认识到国民政府信教自由，不允许不同宗教互相诋毁，使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能够在同一土地上和平共处。

1929年，新疆省政府对基督教采取了一些限制的措施。如新疆省绥来地方荷兰天主教神甫韦德曼（P. H. T. VELDMAN）称前任督办时，给予传教活动以完全的自由，而现在督办“对于鄙人及天主教堂施行各项限制章程，在多处地方不准设立教堂，并不准教堂门前悬挂天主教堂牌，又不准在教堂房上安设十字，且将鄙人夫役勒令入伍当兵，虽经鄙人请求该当局释回，终无效果。”而金树仁认为，“对于天主、耶稣各教历年均施以和平合法之待遇，各教在新疆均各相安无事，得以自由传教，并无何种限制章程。该神甫所称限制各节全属子虚，委系有意挑拨是非”。至于“该神甫所称勒令教堂夫役入伍一节，查新疆不乏充当兵役之人，又何必勒令教堂夫役入伍充兵？”^②省政府认为该神甫“是因欲在奇台任意建设教堂，经官厅阻止未遂所欲，故有前项捏造之报告”^③。

金树仁执政初期，对于外国传教士虽然没有明令禁止不允许传教，更没有不允许在教堂前挂牌之说，但是，中央政府对基督教还没有一个明确态度以前，新疆省政府不允许外国传教士在新疆私自扩大传教规模。1929年，德国传教士奚伯鼐打算在“呼图壁县永租一地建造教堂权定外国教会于内

① 《金树仁就保护教堂教士事致交涉署的呈》（1924年5月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② 《金树仁就荷兰神甫给该国公使投诉事致外交部的的答复》（1929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③ 《金树仁就荷兰神甫给该国公使投诉事致外交部的的答复》（1929年3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地租用土地设置，”^①金树仁下达指令：“外国牧师在新疆设立教堂除原定地点及数目外，未便任意增加。该迪化天主堂司铎奚伯肅所请在呼图壁添设教堂一节碍难照准。”^②这样外国传教士在新疆建立教堂受到省政府的明令限制。

1930年开始，对于外国传教士在新疆的出入，政府命令各区县仔细检查，看他们是否带有违禁物品，这表明新疆政府对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仍给予了较多关注。英国教士胡进洁、马尔昌二人出入昌吉，该“县长兹于本年九月五日下午三（点）钟，案据警察报告英教士胡进洁二人随带跟役一名一行三人，骡马（缺）身行李等件，据此，县长当即亲往查验，”，确实查证次二人“原系迪化教堂旧日教士，并无夹带违禁物品，”才“随派警役守护防范，于七日上午七钟起程进省讫”^③。

在于阗县，教士如果要出境入境，都须县长派人亲自盘查。于阗县长冯梁“有英国基督教士胡立礼，随带跟丁脚夫一行三人，于十八年十二月十六日由婁到境，当派员向该教士逐细盘查。”查清身份及来意之后，该县长即令人将传教士置于“保护之中，仍寓监视之意，幸无测绘特别情事”。^④在传教士出境时派专人“接护出境，随时严密防范，以免疏虞”。^⑤

除对疆内基督教徒出入严加盘查外，对外省进入新疆的传教士也不例外。只要护照过期则视为失效。如1930年传教士柏路得夫妇因护照过期，请求省政府另发护照，如载“敝牧师、师娘商议一面将旧日已过限期之两张护照呈请主席查验，一面再请赏发一张新限期一年之新护照。旧照验毕新照填好，一并赏还到堂，使敝牧师、师娘在地点方面，在驻扎青海本堂之外，

①《奚伯肅为请在呼图壁设教堂事致驻新外交公署的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②《金树仁就迪化天主堂拟在呼图壁设教堂事给交涉署陈继善的指令》（1929年5月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③《郑联鹏为报英国教士胡进洁等入出昌吉境事给陈继善的呈》（1929年10月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④《王作人为接护英国教士胡立礼事致陈继善的呈》（1930年1月1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⑤《王作人为接护英国教士胡立礼事致陈继善的呈》（1930年1月1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并得利行于新疆，在日期方面以免在起程时护照限期已满为要”^①。同年，英国牧师胡立礼由皮山抵达叶城，叶城县县长立即“选派妥警注意保护，并请前途县长接替护送”^②。可见，当时政府对传教士行踪给以较大关注，有较高警惕性。

民国二十二年(公元1933年)，新疆局势发生剧烈动荡。这对基督教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呼图壁，马仲英部下少数人与本地回民武装，为了掩护回民逃难，向县城发起佯攻，把攻城的其中一个制高点。选在与城墙东北角炮台相对的天主堂大草垛上，这时在“天主堂里响起了阵阵紧急的敲门声，当看教堂的王三去开门时，被打死在大门楼下，神甫见势不妙，便持枪躲藏在屋角暗处，几名攻城武装人员没有进屋，却攀上草垛去挥动了攻城的大旗，干草垛与城墙的距离是在步枪有效射程之内，挥旗的当即被守城的归化军和民团打倒了两个，大旗未能树立起来。这时他们就将草垛和教堂的房屋放火燃烧，然后匆匆撤走，幸免于难的神甫，于星夜在春雪融化的泥泞中拨掉了鞋袜，光脚落荒逃至城下，又险被守城的警戒枪毙，后经盘查，知是天主教神甫才放进城去，住在一个天主教徒的家中。这时，远望天主堂已成一片火海”。^③新疆政局的动荡，已经威胁到传教士生命的安全，正常的传教活动根本无法进行。

1933年2月，马仲英派其部将马世明等，窜至乌鲁木齐西郊妖魔山，占据制高点，炮轰省城，经三昼夜激战，西大桥一带民房商店成了一片废墟，使两千多名回、汉良民遭到了涂炭。金马双方伤亡严重，金树仁遂将北门陶公祠(即现今北门第一人民医院原址)改为伤兵医院，聘请了白俄大夫达申科，福音堂马牧师、巴大夫，天主堂的奚伯鼐神甫参加救治伤员工作。历时数月因过度疲劳，巴大夫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病故，不久马牧师也相继逝世。他二人的坟墓，原在东门外无线电台墙后(即今气象站院内)，并竖

①《柏路得等就另发护照事致省主席的呈》(1930年1月22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②《叶城县县长邓聚奎致省府外交署长陈继善的呈》(1930年2月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③李长青：《天主教在呼图壁》，《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有一米高的两块墓碑，刻有英汉两种文字的墓志^①。可见，新疆政治局势尤其是动荡不安的形势直接冲击了新疆的基督教。

总的说来，1912年—1933年，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受到新疆的政治局势影响较大，新疆省政府对基督教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它在新疆的传播，政府对其采取宽容的态度，它的活动规模就大一些，当政府限制它的活动时，它的传教活动阻力就大。

（二）传教事业停滞时期——盛世才统治时期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

1933年底，喀什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反动政权，瑞典基督教行道会驻喀什代办处印刷所，于1934年1月15日接受英国领事馆的旨意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伪政权印行了《东突厥斯坦周报》。半个月后，又为“伪政权”印行了《独立周报》，其中刊登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领导人名单及一些重要文件，为民族分裂活动制造舆论。“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发行的所谓纸币、布币，大多也是这个印刷所印制的。为此，在彻底消灭“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分裂政权后，新疆省边防督办盛世才于1934年8月底，下令封闭瑞典基督教驻喀什代办处，将其中部分人员驱逐出境，查封没收其印刷所全套机器、铅字等设备，交喀什地方当局保管。至此，瑞典基督教行道会驻喀什代办处的活动，宣告彻底结束。

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基督教在有些地方办学校，如绥来县“原有德国籍人奚伯庸者设天主教堂一处，约有男女信徒贰百余人，皆系当地汉族户民。近闻该教堂有设置学校招收各教徒家之子弟读书情事。”县长命令公安局前往调查，局长金国珍答复：“兹查得该牧堂有男女学校一处，其男生共有二十余名，经常到校者不过七、八名，其余多半因家庭生活关系到校日少，在家做活日多，女生亦有七、八名，但在夏季时尚有十数名之多，均系该教堂附近信教户民之子女”。根据现实的需要，当时的教育内容为“三民主义、

^①《乌鲁木齐基督教史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乌鲁木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7辑），1984年版。

国语、算术、自然党义等课书”^①。虽然该传教士并无违背法规的行为，政府仍然命令撤销他所办的学堂。

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严格限制外国传教士的活动，对传教士的办学持怀疑态度，认为“该教堂传教私自设校教学事前并未来县声明备案，该教士又为外籍德国人氏，其中有无别种寓意，殊难悬揣，事关本省文化，未便忽视”^②。1935年7月25日，新疆省政府以基督教徒“护照已经过期应饬出境”^③为由，不让他们继续在新疆传教。

1938年开始盛世才制造了一连串的“阴谋暴动案”，关闭了教堂，捕押了一些传教士和教徒，基督教在新疆的活动处于停滞状态。盛世才认为瑞典传教士及其中国教徒在新疆的活动是为了刺探情报和做密探，1938年2月将在教堂中教士和中国教徒逮捕入狱。“对瑞典教堂生命财产新省各地当局均予以相当保护，对该教堂向无侵犯及危害情事。惟该教堂在新曾作反对政府，进行密探工作之事。实当南疆事变时，叛首伪第六师代理师长阿不都尼牙孜曾致函驻莎车福音教堂，内容系感谢该牧师此次查出对政府忠实人员及帮助计划等云，又查出冯祥者给教堂报告莎车驻军兵力、军官姓名及户口等。新省政府认为该中国籍人员给该教堂作密探实属危害，当即将充密探人员逮捕。”^④外国传教士也被牵连进去，有些传教士被捕入狱，教堂及其教产充公。有的传教士遭到杀害，未遭杀害的传教士直到盛世才下台离开新疆后才获释放。

1941年后，盛世才投靠国民党政府，基督教一些原来在新疆活动的教团恢复了活动，一些新的教团也纷纷进入新疆设立教堂传教，神父、牧师多为中国人。

①《臧谷峰等就天主教奚伯鼎在绥来传教等事致省政府的呈》（1936年11月2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②《臧谷峰等就天主教奚伯鼎在绥来传教等事致省政府的呈》（1936年11月2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③《给尧司令、刘行政长的电》（1935年7月2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④《盛世才就瑞典教堂在新行密探事致军事委员会的电稿》（1938年2月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1942年，新疆省政府允许基督教传教，但严密监视他们的行动。“《敌国人民处理条例》及《敌国国籍教士集中及保护监视办法》之规定，对于敌国人民天主及耶稣教士之免于收容者，系由各省政府（院辖市）指定适当之天主教堂及华人主办之耶稣教堂集中传教。本部为明了各该国教士集中情形，以便监护周密。”^①1943年，外国传教士都被迫离开了新疆。只有中国籍的教务人员被准许留在教堂从事合法的宗教事务。

（三）传教恢复时期-----国民党统治时期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

盛世才统治新疆时期实行禁教和驱逐传教士政策，国民党在新疆确立统治地位后，基督教又来到新疆。主要特点是内地各教派开始涌入新疆，以汉族传教士为主，基督教本地化趋势明显。新疆中华基督教会成立之后，玛纳斯，呼图壁、米泉、阜康，奇台，哈密等县的教会，都愿意和它取得联系，成为中华基督教会新疆分会的一部分。

新疆中华基督教会是由我国基督教徒李开焕、翟明霞于1946年在乌鲁木齐创办的。李开焕是江苏南京人，自幼信奉基督教，属“内地会”（英国的传教差会）。他曾就读于河南开封教会学校，嗣后考中开封邮务员，1938年调往云南昆明邮局，一面工作，一面协助当地教会传道，并结识了一位名叫翟明霞的女教师，因为志同道合，结为夫妇。他们到乌鲁木齐之后，于1946年2月24日正式成立“新疆中华基督教会”。该会在乌鲁木齐设立总会，在其它各地设分会。在乌鲁木齐借到省药房两间会议室（今大十字五金商店西面，施洗礼拜则在水磨沟香泉浴池），工余之暇，传播基督的福音，并在星期天开大礼拜^②。

当时李开焕牧师、王金铭执事，还有其他主内同道，如郑终吉、韦更西、何恩证，经常不定期的巡回各县，传播基督福音，深受各地教会的欢迎。1947年，新疆允许荷兰教士米德林神甫来新疆传教，但“不得对新疆回教人士传

^①《宪兵司令部为对免于收容的敌籍教士集中传教事致省政府的函》（1942年3月1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②《乌鲁木齐市志》，第1卷。

教，以免发生反感”^①。

1948年，山东济南、潍坊等地“灵修院”、及圣经学校的学生、牧师，自愿结合献身来新疆传福音，分南北两路，轻装简束、千里跋涉、进疆传道。这批传教者的组织当时称“西北圣灵工作团”，是“没有受任何团体或个人的分派，只是奉上帝的召唤，到西北工作的一个工作团体”^②，在哈密集中后，集体开办了诊所，并分工经营缝纫、钟表修理、木器制作，积累资金，为哈密建起一所教堂。后来在张谷泉等牧师的领导下，灵工团团员陆续分赴南北疆布道。1949年4月该团分配王宗仁、朱长信二团员，来我县定居传道。当时寄住在东正街南面杜家木楼下，平时搞铁皮加工焊补维生，星期日传教或作“主日祈祷”聚会^③。

①《麦斯武德给外交部的代电及给外交部驻新特派员公署的公函》（1947年7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②魏长洪：《基督教西北灵工团在哈密的兴衰》，《新疆文史》，2002年第1期。

③《基督教在我县传播的梗概》，《北庭文史》（第5辑）。

四、基督教对新疆社会的影响

清末民初的新疆，各种宗教都力图扩展自己的影响和势力。基督教也不例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的各宗派派来数批传教士，希图将基督教在穆斯林中广泛传播，使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改宗，他们在当地开设医院，兴办学校，出版刊物，例如，“瑞典传教团的人员在喀什噶尔城、英吉沙和叶尔羌建立了传教站，在这些地方，他们治病，为儿童开办学校，举行宗教仪式、此外还深入家庭访问，把《圣经》、《圣歌》、宗教小册子译成维吾尔文，他们的医疗活动特别受人欢迎，很兴盛，每天都有大批人涌来找他们看病”^①。这样，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教活动对新疆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基督教会在新疆开设医院，为当地老百姓解除病痛，将西方的医学文明带入新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疆，医疗条件极其落后。当时在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更习惯于用自己传统方式来对待疾病。“一旦孩子们有了病，父母亲一方面不知道得的是什么病，另一方面也很迷信，他们的想法似乎是赶快去找上一个巫医给孩子治病。在冬天寒冷的日子里，我还见到小孩子们在大街上跑来跑去，而他们正在出天花！孩子就这样死了，父母亲又悲痛欲绝，在这里天花是一种极可怕的疾病而当地人却不去做任何事，防止他传染蔓延，当地人的看法是，如果让一个人或他们的孩子染上这种病，是安拉的旨意，那么什么也挡不住。如果不是安拉的旨意，谁也染不上这种病，这也是他们对任何事情的态度，这样倒也省却了不少麻烦和忧虑。”^②因为医疗条

①[英]凯瑟琳·马嘎尔尼著，王卫平译、[英]戴安娜·西普顿著，崔延虎译：《外交官夫人的回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6页。

②[英]凯瑟琳·马嘎尔尼著，王卫平译、[英]戴安娜·西普顿著，崔延虎译：《外交官夫人的回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9—100页。

件的落后，“一些常见疾病并发成严重的恶性病症。传染病有牛痘和斑疹、伤寒，特别是出天花十分普遍。然而当地居民很少去看病”^①。传教士到新疆后，尤其是瑞典传教团在南疆开展的医疗救治工作，受到当地百姓的欢迎。叶尔羌的瑞典传教士古斯塔夫·拉奎特，除了传教外，还“广泛开展医疗工作，在传教站里，有一个配备齐全的药房，当地居民付很少的药费，就可以从药房拿到药品。那里有成套漂亮的发着亮光的医疗器具，还备有常见病病人的免费病床”^②。赫伯格神父专门从事医疗方面的工作，诊疗所里有“37个病人在小小的院子里等着看病。有一个很瘦的维吾尔人躺在那里，胸口有一处很深的刀伤。当他呼吸时，从肺部流出一股股血水，好几个病人身上都有陈旧的伤口”。^③这说明病人病情不到严重的地步，是不会来找医生的。

传教士的医疗救治工作得到了当地百姓的认可，马达汉对赫伯格是这样评价的：“赫伯格先生是在实践中边学边干才使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这门值得尊敬的、美好的行当更应该得到赞扬”^④。传教士希望他们的医疗救治工作能够推动他们的传教事业，事实上，穆斯林愿意得到他们提供的帮助，但是穆斯林基本上不可能改宗，马达汉在1906年的喀什噶尔日记也说：传教士为“维吾尔穆斯林信徒看病已经好长时间了，但没有一个穆斯林来受洗礼的”^⑤。

西方传教士在新疆尤其是南疆的医疗救治工作，从根本上说，他们为了使穆斯林及其他各族民众改信基督教，虽然传教的目的并没有完成，但是对新疆来说，传教团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输送医疗设备和医学人才，他们将西方先进的医学技术带进了新疆，他们在喀什噶尔治病救人，这无疑有利于新疆社会的进步，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① 《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50页。

② 《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第49—50页。

③ 《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④ 《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⑤ 《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二）基督教会在新疆各传教点开设学堂，将较为先进的科学知识和西方的思想观念带入新疆。

外国传教士为了在新疆有利地进行传教，在新疆兴办了一些学校，学生主要是那些已经皈依基督教的教徒的孩子，在伊犁地区，很早就已有传教士使团在活动。传教士开办的学校有好几所，并且都是按汉族学校方式组织的，任教的都是汉族教师。只有宗教课由传教士讲授，学生们的品德教育也是由他们负责。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水平较高，甚至外表上也与其他汉族学堂的学生不同。他们总是干干净净，穿戴整齐。但是，“入教会学校的主要是那些基督教徒们的孩子。至于其他汉族人，就几乎全是家境贫寒的人，由于无力送孩子进汉族学堂，才肯把孩子送到那儿去上学。在汉族学堂，总得有所花费，而教会学校则是免费的，同时还有各种津贴”。^①许多汉族百姓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教会学堂读书，但是他们很少有人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入教。在叶尔羌，“正在筹建一所能容纳40个学童的小学，计划教学生读书、写字、算术、地理和自然这些基础科目，此外学生们还可以在毛拉指导下学习做一般的穆斯林祈祷——这是瑞典教会显示包容态度的精彩之举，这项工作的宗旨显然不在于夸耀有多少穆斯林转变过来，而是进行民众教育，以便让他们自己擦亮眼睛，有能力在不同宗教之间做出选择”^②。

从传教士办学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传播宗教，甚至对伊斯兰教采取包容态度，力图用实际行动促使穆斯林改宗。很明显，他们这一目的并没有取得实际的效果，但是，传教士在新疆或多或少的一些教育活动，扩大了新疆教育的范围，使新疆的一部分民众接触到一些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在客观上说，应该是历史的进步。

① [俄]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234页。

② 《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第49—50页。

（三）基督教在新疆开设印刷所，为新疆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瑞典传教团在喀什创办的印刷所，以设备齐全、印刷上乘而著称，他们刚开始印刷的是和宗教有关的内容，如“书籍、圣歌集、宣传品、小册子，也有一些传教士自己写的作品，”^①这些印刷品多和宗教有关。

1911年瑞典传教团开始印刷属于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印刷品，当时主要为学校印刷维吾尔读物，刚开始是用旧式手动印刷机印刷，印刷的教材也是用手写体印刷出来的。1912年，随着现代印刷设备运到喀什噶尔，为学校印刷的教育材料数量剧增。教材的内容从入门教材到地理、科学方面的各种教科书都已印刷出版，大部分是从瑞典小学或成人教育机构使用的教材中翻译过来的，但进行了修订或改写，以适应新疆的情况。有些教材包含对日常生活的劝导内容。还有关于人体卫生常识的内容。1936年出版的《中亚史》，“标志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已超越了其教育方面的目标而转向了对公众的教育”。1935年出版的《维吾尔语语法》，也“可以认为是属于这种转向的体现之一。”^②除此以外，传教团还出版了历书。

瑞典传教团在喀什噶尔的印刷史上写下了重要一页，“《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印刷所文献目录》所附照片中维吾尔青年排版、机印的工作情形，明确告诉我们，这为新疆造就出新一代的技术工人”^③，他们为喀什噶尔等地带来了先进的印刷设备和技术，印刷了大量的教材，有利于文化知识的普及。

但不可否认，瑞典传教团的印刷所在喀什噶尔的印刷活动，也对新疆社会产生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为新疆的叛乱政权提供过便利条件，客观上对新疆的民族分裂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成为新疆分裂政权的帮手。1933年9月，新疆一批分裂主义分子，想要用武力接管喀什噶尔的印刷所，当时

①[瑞典]贡纳尔·雅林著，崔延虎、郭颖杰：《重返喀什噶尔》，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3页。

②[瑞典]贡纳尔·雅林著，崔延虎、郭颖杰：《重返喀什噶尔》，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③周轩、崔延虎：《瑞典传教团在喀什噶尔研究》，《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

瑞典传教士“保证超时间工作以确保完成交给印刷任务的方式，成功地把印刷所掌握在我们的手中”^①，他们为这个所谓的“新政权”（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印刷了大量的刊物，如《独立》、《东突厥斯坦生活》、《独立突厥斯坦》、《新生活的自由》等刊物。瑞典传教士辩称他们是被迫为叛乱者印刷，但是，瑞典传教团在新疆的目的是为了传教，他们开办的“印刷所所有工作是商业性的，”而且他们认为1934年时“商业利润一直比较好”^②，我们认为，瑞典传教士为了在新疆生存下去，承接了当时叛乱政权让他们印刷所有刊物的任务，不能说他们完全是被胁迫，只是出于继续在新疆传教的需要。尽管如此，他们的这种行为仍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

（四）传教士在移植基督教文化的过程中，与新疆穆斯林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同为一种教，《古兰经》第一章第一节这样写到：“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报应日的主，我们只崇拜你，只求你祐助，求你引导我们上正路，你所祐助者的路，不是受谴怒者的路，也不是迷误者的路。”^③穆斯林不可能放弃自己原有的伊斯兰信仰而去改信基督教，当“维吾尔人转而信仰基督教时，家庭悲剧就出现了，有人会强迫他们离开这个地区”^④，在他们眼中，这将是一桩弥天大罪。即使偶尔有穆斯林皈依了基督教；这部分人也常常是因为被传教士医治好了疾病，他们出于感激之心而受洗入教。“那些脱离伊斯兰教而转向‘拿撒勒’（犹太教徒、伊斯兰教徒对基督教的称呼）的人，往往来自那些对宗教不那么严格要求的下层社会中，因此，反响不显著。”即便如此，他们仍然要承受和面对来自穆斯林社团对其背叛信仰的巨大压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基督教对新疆

①[瑞典]贡纳尔·雅林著，崔延虎、郭颖杰：《重返喀什噶尔》，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5页。

②[瑞典]贡纳尔·雅林著，崔延虎、郭颖杰：《重返喀什噶尔》，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

③马坚译《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版，第5页。

④[瑞典]贡纳尔·雅林著，崔延虎、郭颖杰：《重返喀什噶尔》，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3页。

穆斯林的传教收效甚微。

1940年,《教务杂志》刊登了瑞典传教士盖纳娃(Geneva)写于1939年8月的《新疆基督教传教事业的终结》一文,该文认为传教士在新疆进行传教活动的40多年中,前25年传教工作不力,发展的教徒不超过30个,后20年改变了传教方式后,皈依的教徒较多,形成了4个基督教徒群众组织,其中两个基督教组织是由当地维吾尔群众组成。传教团在传教过程中,曾发生过3次较大的冲突。前两次是“伊斯兰狂热分子煽动的,几位当地皈依基督教的维吾尔青年被害。”^①。盖纳娃把冲突归咎为“伊斯兰狂热分子”,但是当地民众又将传教士们诅咒为“宗教贼”。在中西文化之争中,传教士们是处在最前线的,他们的“全球化福音运动”在新疆少数民族地区遇到了障碍,引起了不可避免的冲突。为了缓和与当地穆斯林的矛盾,传教士采取了循序渐进,医疗和教育辅助的社会福音派的布道方法。更重要的是,对维吾尔族的文化进行了长时间深入的调查,采取相应的传教对策,从而避免了较大规模冲突的发生。

盖纳娃所说的第三次冲突发生于1938年,“其原因是由于新疆当局发起的无神论运动引起的,造成传教士被驱逐,教堂被焚,许多皈依的维吾尔信徒被害”^②。指的是1938年盛世才下令驱逐外国传教士、关闭教堂的举措。

① 《The Chinese Recorder》,《教务杂志》,1940年1月,p.58—59。

② 《The Chinese Recorder》,《教务杂志》,1940年1月,p.58—59。

结 束 语

清末至民国，在西方列强大肆侵略中国之际，出现了西方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高潮。基督教一方面在沿海内地建立传教布道基地，另一方面也大举浸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他们在伊斯兰教拥有巨大影响力的新疆做出了极大努力，竭力想达到使穆斯林民众改宗的目的，希图通过传播“福音”来改变中国人的“异教”信仰，继而改变与宗教信仰相关联的道德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用西方基督教文化改造新疆各民族的文化和社会，用基督教文化征服和取代中国文化。

在新疆的三个较大的传教团体中，天主教的圣母圣心会在北疆主要城市开设教堂，开办医院，开设学堂，付出种种努力，它的主要负责人石天基1883年进疆，1913年病逝于伊犁。内地会派来新疆的先驱胡进洁，1906年建立迪化福音堂，带领马慕杰等内地会传教士奔走于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四处散布福音书，学会了用维语、哈萨克语、蒙语向少数民族传教，1938年胡进洁被盛世才囚禁，出狱后，1946年病逝于甘肃。马慕杰于1933年在马仲英围攻乌鲁木齐时，为抢救当地驻军的伤病员过程中感染伤寒不幸去世。瑞典传教团在南疆开设印刷所，为当地印刷各种刊物，开办医院，为穆斯林群众医治身体病痛，但他们的灵魂却拒绝这些热心的传教士的“救助”。种种事实让我们看到，西方传教士在新疆地区传教的举步维艰和难以维系，最后以基督教从新疆穆斯林中黯然离去而结束。

历史事实表明，他们在新疆的传教事业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这些阻力有来自于中国政府的禁教政策，有来自于各族群众对本民族文化根深蒂固的传承，以及他们对传统宗教习俗毫不妥协的坚守，更来自于新疆的各阶层人们对不同性质文化的西方宗教传播的不予接纳，甚至以强烈的敌视态度予以抵制和拒绝，使新疆成了“这个世界上基督收成最差的地方”。

我们进行基督教在新疆传播的研究，对于探讨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正确对待外来文化，吸取历史经验教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维护祖国统一，无疑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参 考 文 献

史 料

- 1、(英)凯瑟琳·马嘎尔尼著,王卫平译,(英)戴安娜·西普顿著,崔延虎译:《外交官夫人的回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2、张大军:《新疆风暴七十年》,台湾兰溪出版社,1980年版。
- 3、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台湾文海出版社,民国54年版
- 4、顾为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 5、《新疆图志》,上海籍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 6、《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清末教案》(外务部档)(第3册),中华书局,1996年版。
- 7、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著,新疆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译:《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 8、(瑞典)贡纳尔·雅林《重返喀什噶尔》,新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 9、(瑞典)斯文·赫定著,徐十周等译:《亚洲腹地探险八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 10、马达汉:《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版。
- 11、吉六:《从〈新疆图志〉谈外籍教会的问题》,《新疆文史资料》(第3辑)。
- 12、《关于迪化福音堂的三份档案材料》,《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6辑)。
- 13、李长青:《天主教在呼图壁》,《呼图壁文史资料》(第2辑),另《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 14、黄清治:《乌鲁木齐基督教史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

- 委员会：《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7辑），1984年版。
- 15、赵慕萱：《基督教在我县的传播梗概》，《北庭文史》（第5辑）。
 - 16、李长青：《天主教在呼图壁》，《昌吉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
 - 17、（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与基督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 18、（美）保罗尼特著，王志成等译：《一个地球多种宗教》，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 19、Mildred Cable and French Sca Francesca French: *George Hunter Apostle of Turkestan*,《新疆的使徒——乔治·亨特》，Newington Green London, 1946。
 - 20、《The Chinese Recorder》，《教务杂志》，Shanghai, 1874—1941。
 - 21、Mildred Cable and French Francesca French: *The Gobi Desert* 《戈壁沙漠》，Hodder and Stoughton, London, 1942。
 - 22、Watt, W Montgomery, *Islam and Christianity, Today: A Contribution to, dialogue*, 《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一次卓越的对话》，London, 1983。

学术专著

- 1、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2、张西平、卓新平：《本色之探》，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
- 3、（韩）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 4、斯潘塞·J·帕默著，向红笏、徐晓冬译：《世界宗教概览》，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 5、杨森富：《中国基督教史》，台湾商务出版社，1980 年版。
- 6、于本源：《清王朝的宗教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 7、乐峰《东正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版。
- 8、(英)阿诺德·汤因比著，晏可佳、张龙华译：《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年版。
- 9、张践、齐经轩：《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 10、中国人民大学基督教研究所主编：《神学与诠释—基督教文化学刊》(第 10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 11、杨镰：《新疆探险史图说》，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
- 12、秦家懿、孙汉思、吴华译：《中国宗教与基督教》，三联书店，1990 年版。

学术论文

- 1、木拉提·黑尼亚提：《近现代新疆西方基督教传教士研究》(2001 年提交的南京大学博士论文)。
- 2、唐世民：《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新疆社会科学》，1984 年第 4 期。
- 3、房建昌：《历史上基督教在新疆的传播》，《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8 年第 11 期。
- 4、魏长洪：《基督教西北灵工团在哈密的兴衰》，《新疆文史》，2002 年第 1 期。
- 5、木拉提·黑尼亚提：《近代新疆天主教会历史考》，《西域研究》，2002 年

第3期。

- 6、木拉提·黑尼亚提：《新疆内地会传教士传教经历及其中外文姓名的勘同》，《西域研究》，2003年第4期。
- 7、木拉得·黑尼亚提：《喀什噶尔瑞典传教团建堂历史考》，《新疆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 8、木拉提·黑尼亚提、阿合买提·艾赛因：《了解近代维吾尔族民间文化的重要资料——〈瑞典传教团南疆人类学田野调查报告〉述评》，《西域研究》，1999年第4期。
- 9、房建昌：《近代新疆基督教的研究及史料》，《新疆大学学报》，1998年第4期。
- 10、魏长洪：《近代西方传教士在新疆》，《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 11、房建昌：《近代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西北少数民族中的传教活动及有关文献概述》，《西北民族研究》，1994年第1期。
- 12、周轩、崔延虎：《瑞典传教团在喀什噶尔研究》，《西域研究》，1998年第4期。

后 记

终于给毕业论文划上了最后一个句号。手捧这沉甸甸的三年苦读的成果，怎不让人心潮起伏，思绪万千。

忘不了我的恩师孟楠教授，他胸怀宽广，为人大度，没有因为我师出旁门而拒我于史学殿堂的门外。忘不了雷打不动的每周三下午的例会，他讲评大家的习作，时而春风化雨，娓娓而谈，时而慷慨激昂，句句铿锵，让大家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我敬佩导师教导呵护学生不辞辛劳的敬业精神，我更敬重导师光明磊落，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品格。三年来，恩师对我所有的言传身教，悉心指导，都将是我记忆里永远的珍宝，更是我今后人生旅途上的路标。

忘不了历史系魏长洪教授，忘不了在论文开题报告会上，他给我列出的一长串详实的参考资料，忘不了他给我一次次热情的鼓励和耐心的指导。忘不了管守新博士对我的论文结构提出的宝贵建议。

我还要感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局局长许新江先生、历史处处长童鹿先生，他们给予了我查阅档案资料的便利，让我能够顺利得览论文所需的珍贵档案资料。感谢历史系的王茜教授、文科基地资料室的冯素老师给我提供的帮助和鼓励。

感谢我的同学左红卫、赵玉霞、阿地力、赵彦**俊**、苏奎俊、杨红、陈海鸣、王聪延、古娜、夏晨茹、刘湘娟、陈健，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帮助我校改论文，并给予我许多合理的建议。

感谢在我读书的三年时间里始终如一的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的朋友们，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我无以完成学业。

所有为本论文写作付出辛勤劳动的老师和同学和朋友们，我深深地感谢你们！